



# “丝路”华文教育与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之路

王真真, 曾繁健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世界文化与文明交融发展的要求,更是中国文化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寻求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可能路径与对策建议,促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根据比较教育学及跨文化教育的原理,以内容分析为方法,借助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结合相关数据总结了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之路,即:华裔中国名家的自塑之路,西方汉学家的“他塑”之道,多语种并行的外语教育,译介的推广,国外留学、访学人员的文化推动,“孔子学院+”的多渠道传播,及中国经济与自然科学内容的添加等路径。这些路径将有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国家形象的优化以及民族复兴。

**关键词:** 丝路;华文教育;当代中国文化;西渐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49; G1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1)02-0050-08

##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on the Silk Road and the approache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o West

WANG Zhenzhen, ZENG Fanj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is not only a requirement for the exchange of world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but also an intrinsic need for Chinese culture to pursue its own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o West and promote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overseas countries and China.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he paper uses content analysis and NVivo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to put forward some way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o West, such as the self-shaping road of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overseas countries, the other-shaping path of overseas sinologists, multilingual education, the promotion of translation, the cultural promotion of overseas students and visitors, the multi-channel dissemina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 Plus" and the addition of knowledge about economics and natural science in China. The approaches will enhance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establish a good national image and realize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approaches for Chinese culture to West

自秦汉时期,中西方文化就开始相互往来,互联互通。这条沟通中西、连接中外的交往路线,直至1877年,才被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它打开

了中西文化交流与包容的窗口,更为世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19世纪末以来,不少中国名家也“丝路”西渐,在国外或留学、或访学、或旅

收稿日期:2019-11-06 网络出版日期:2020-11-05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8YB115)

作者简介:王真真(1994—),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笔译、跨文化与比较教育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曾繁健, E-mail: ZW2401800638@163.com

行、或工作，他们在异乡他国的言谈举止，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得以邂逅；他们在努力适应与学习异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在他国进行华文教育，参与西方汉学的研究，甚至投身于中国文化艺术的海外实践与传播。因此，丝绸之路开辟以来，西方的宗教信仰、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就传到中国，中国东学也络绎不绝地往来于西方。自此，历史上确立了东学西渐的中国文化传播模式。由此及彼，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也可以搭乘类似“丝路”延伸的华文教育，续写世界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乐章。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丝路”，仅指类似于古代“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路径，主要是功能对等，而非文化传播方向、路线及历史地域的严格对等。所以，这里的“丝路”华文教育，实质是广义世界华文教育的含义，但又秉承了古代丝绸之路东学西被的中国文化传播模式的内涵。

教育与文化紧密相连，水乳交融。所谓教育，《劝学》有云：“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显然此中的教育存在教化、教导、培养之义；而“文化”的内涵，可从《补亡诗·由仪》中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加以概述，即文治、教化之意。拉丁语中的“文化”与“耕耘”同义，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就曾用“Culture mentis”（耕耘智慧）指代“文化”一词，他认为文化可以改造、完善人的内心世界，使其成为理想公民<sup>[1]</sup>。从中西有关教育论述的源头进行推论，教育与文化的主动介入，必然对人的思维方式及认知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一国良序公知的规约管理、国家的形象推广与文化传播产生积极作用。而华文教育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概莫如此，二者之间须臾不分，相互促进，前者是后者的有效手段，后者是前者的终极目标。陈明杰<sup>[2]</sup>指出：“华文教育不再是侨民教育，而是华族进行民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的教育。”林蒲田<sup>[3]</sup>坦言：“华文教育的宗旨不再是培养下一代华人，而是传播和教授中华语言文化。”既然中国文化是华文教育的核心要旨，那么反观东风西渐及西风东渐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再构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之路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华文教育显然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它是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合理路径之一，是中华文化钩沉历史、融通中外、与世界美美与共的极佳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避免当代中国文化落入自赏自封境地的防御方法。

纵观华文教育的研究发展，大部分学者都侧重分析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难点及对策，也有少量学者从华文教育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化西渐的可

能路径，如张梅<sup>[4]</sup>认为华侨华人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且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策略建议；谷慧娟<sup>[5]</sup>以《论语》的英译出版为例，总结与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与方法。但上述研究多集中于某一学科或某一方面，涉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法的概括性、原则性强，对对策的细化与批判却不够；尤其从“丝路”华文教育探讨中国文化西渐的路径也言之不详。因此，本文根据与华文教育学人相关的数据资料，分析东风西渐的华文教育策略选项与疏漏，并据此寻找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重点方向及其补充路径，以讲好中国故事，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

### 一、东风西渐的华文教育数据分析

在内容分析法指导下，借助 NVivo 软件，以陈才智<sup>①</sup>汇编的 352 位华裔汉学家<sup>②</sup>的统计表<sup>③</sup>为源头数据，剔除 151 位无法查证或资料不全的华裔汉学家之后，对汇总表中 201 位华裔汉学家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分类，主要类目包括以下五大类，即：a) 华裔汉学家华文教育的贡献领域；b) 华文教育职业类别；c) 西渐国度；d) 华文教育的主要贡献年代；e) 他们与西方汉学家的关系。同时，对这些类目的相关信息进行了逐字逐行的编码赋值。其中分析前三类数据是为了从东风西渐的华文教育数据发现华文教育策略的可能疏漏，最终推导出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必由之路。后两个类目的数据获取在于证实华裔汉学家对“丝路”华文教育兴盛的贡献，而这已经在《中国学人“西”渐：“丝路”华文教育兴盛的缘起》<sup>[6]</sup>一文中得到了论证，本文不再赘述。但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的华裔汉学家的数据始于 19 世纪末，止于 2018 年。而华裔汉学家的数据之所以能够为华文教育学人的数据分析所用，在于二者之间从事的工作内容具有很大的竞合度，前者为广义海外华文教育的氛围拓展、海外华文教育的实践、世界汉学研究的推动、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等，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借助 NVivo 质性软件，对 201 位华裔汉学家所涉及的华文教育贡献材料进行质性分析与统计，得出西渐学人的华文教育贡献领域数据表，如表 1 所示。

① 陈才智(1971-)，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海外汉学研究。

② 意指“华夏族的后裔”。

③ 资料来源：<https://www.docin.com/p-455938016.html>。

表1 西渐学人的华文教育贡献领域

华文教育贡献领域 <sup>①</sup>	匹配节点数	占比/%
中国人文经典的外文著述	51	25.37
中国文学评论	51	25.37
中国历史著述	26	12.94
华文教育(教习)	23	11.44
中国人文经典翻译	19	9.45
中国文化传播	19	9.45
图书馆管理(长)	4	1.99
经济学	3	1.49
其它 <sup>②</sup>	2	1.00
翻译	2	1.00
华文创作	1	0.50
总节点数	201	

从表1中发现,华裔汉学家的全球华文教育贡献匹配节点数主要分布在以下六大领域:a)中国人文经典的外文著述;b)中国文学评论;c)中国历史著述;d)华文教育(教习);e)中国人文经典翻译;f)中国文化传播,这六大方向节点数的总和已经超过了总节点数的四分之三,而对经济学、翻译、华文创作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贡献则寥寥无几。从占比也可推断,西渐学人的华文教育贡献主要聚焦人文艺术领域,尤其以中国人文经典的外文著述及中国文学评论为最,两者占比一半以上,其中前者包括大量的中国文学经典的外文著述。如果把中国人文经典翻译与前述二者综合考虑在内,中国文学与中国人文经典的占比则高达华文教育内容的60.19%,而直接从事华文教学(教习)的比例只有11.44%。可见,华裔华文教育的贡献领域分布较不均衡,人文学科领域占比过多,经济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则鲜有涉及。

如果把研究目光投向西渐学人的华文教育职业类别,在类目“华文教育的职业”下建立属性值,然后从NVivo中提取相关数据,得到西渐学人的华文教育职业类别数据表,如表2所示。

表2 西渐学人的华文教育职业类别

华文教育的职业类别	匹配节点数	占比/%
教授(研究员)	129	64.18
学生	18	8.95
讲师	15	7.46
译员	12	5.97
文化与艺术大使	8	3.98
国外访学	8	3.98
其它	5	2.49
图书(艺术)馆管理员(馆长)	4	1.99
华文作家	2	1.00
总节点数	201	

表2的节点数统计结果显示,教授(研究员)的匹配节点数最多,其次依次为海外留学生、讲师、译员、文化与艺术大使、国外访学人员等华文教育职业。同时,通过各职业类别的所占比例也不难发现,能够对世界华文教育施加影响、产生积极作用的主力军依然是教师,尤以教授(研究员)及讲师为主,二者占比约高达72.00%,并且他们的职称级别越高,作用就越大;其次为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占比8.95%)和译员(占比5.97%),他们对世界华文教育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上述数据也表明,大量精通汉语母语与外语的双(多)语译员或人才,以及“他塑”中国文化的西方汉学家,并未出现在世界华文教育的舞台。他们能够提高信息交换的质量,促进中国核心文化、科学在域外国家的融合贯通,并能降低文化与科学交流的部分屏障,实现在既有文化冲突、又有文化对等情境下他者宝鉴中华的文化利用。此外,国外访学人员中具有理工科技背景的华裔专家,他们融入华文教育并参与实践教学的程度较低。

如果把研究目光投向西渐学人华文教育的西渐国度,在类目“西渐国度”下建立属性值,然后从NVivo中提取相关数据得出中国学人华文教育的西渐国度数据表,如表3所示。

表3 西渐学人华文教育的西渐国度

华人西渐国度	匹配节点数	占比/%
美国	153	76.12
英国	17	8.45
法国	11	5.47
澳大利亚	5	2.48
加拿大	4	1.99
新加坡	4	1.99
日本	2	1.00
俄罗斯(苏联)	2	1.00
马来西亚	1	0.50
意大利	1	0.50
德国	1	0.50
总节点数	201	

① 该类目下所有的属性值是根据其它自建数据库,以及自己以往的知识经验所进行的赋码编值,进而根据这些属性值,在陈才智汇编的数据库中寻找所对应的匹配节点数,匹配节点数越多,则说明聚焦于该领域的人数越多,匹配节点数越少,则说明这些领域是中国文化西渐过程中所需要加强和完善的,同时这也是数据发现与启示的源头所在。

② “其它”是指除了表中所指的属性值(如中国人文经典的外文著述、中国文学评论、中国历史著述等)之外,还存在的未被纳入该表的属性值。

表3的质性统计结果表明,美国是华人西渐国度的主要阵地,匹配节点数高达153,其次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而像日本、俄罗斯(苏联)、马来西亚、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匹配节点数则很少。其中,西渐学人华文教育的国度主要集中于美国,占比76.12%,这一数据明显高于截至2017年在美国建立的111所孔子学院数量的占比21.14%。但自2004年国家汉办创立海外孔子学院以来,孔子学院数量排名靠前的国家依然是美英等欧美国家,占525所孔子学院中的353所,比值达67.24%,这一历史趋势并未根本改变,只是德国及俄罗斯的汉学教育得到了更大幅度的提升,分别位于第四及第五的名次<sup>[7]</sup>。换言之,英语国家依然成为了中国海外华文教育的主流阵地,而非洲、中亚、南亚及西亚的丝路沿线国家的华文教育依然增长不足。鉴于此,多语种并行的“丝路”华文教育必须得以贯彻。

## 二、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之路

中西文化对话,亘古不变的规律;中国文化西传,国人前行的不竭动力。从文化学的学理视角来看,“任何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都必须放到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和对照中去认识,否则就有可能把那些仅仅属于某个特定社会的价值和习俗,当作人类普遍的信念和行为规范”<sup>[8]</sup>。因此,中国文化的西渐之路显得尤为必要。但需要警醒的是,文化走出去,应把握文化之间的特征与异质性,并以合理的西渐路径减少文化冲击,进而从真正意义上融通中西文化。而基于上述质性分析数据,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可能路径则逐渐明晰化。

### (一)华裔中国名家的自塑之路

身份的建构与形象的确立,对自我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形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名家的域外书写,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得以相遇,不仅开展了良好的华文教育,而且满足了西方注视者对异国情调的文化需求,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域外交流。

林语堂即是其中的翘楚,他行走东西,游刃有余,与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等西方学者交往甚密。他在美国用英文撰写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一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不小的轰动。全书以诙谐幽默的笔调,给世界呈现了真实、多样而又对立统一的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为华文教育之路的开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此书,他获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的提名。赵元任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化西传的众多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据刘岩<sup>[9]</sup>所言,“赵元任获博士学位留哈佛大学任教后不久,便于1922年2月26日接受美国诗人洛维尔(Amy Lowell)的邀请前去做客。他们共同讨论中西诗歌,洛维尔还把自己翻译的中国诗拿出来请赵元任指教。”赵元任无疑是海外中国名家助推东风西渐的极佳样本。辜鸿铭先生贯通英、德、法等九种西方语言,荣获十三个博士学位。十岁时,他随父前往英国接受系统学习,后又在法国与德国留学。由于深谙中西文化,辜鸿铭开创了中英文对照的儒家经典文化翻译的先河,翻译了《论语》(*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1898)、《中庸》(*The Conduct of Life*, 1906)和《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1915);他还以英文为第一语言,撰写了介绍当代中国文化的系列专著,如《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1910,原名《清流传》),以及《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又名《春秋大义》)等。他的这些译著或著作一度成为德国某些大学东方学院的必读书目,对国外华文教育的发展贡献卓著;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标杆人物。

### (二)西方汉学家的“他塑”之道

中国名家的自塑之路是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一翼,而西方汉学家的“他塑”之道则是另外一翼。中国文化西渐只有在两者的共同运作下,方能有的放矢。毕竟“中西方文化与文论的对话,更需要异质性的话语”<sup>[10]</sup>。西方汉学家即是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异质话语主体。他们因为对中国文化着迷,而与中国结缘;他们借由华文教育学习中国文化,最终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代言人。他们塑造了“他者”形象,展示了西方本土意识的异国风情,无形之中加快了中西文化的对话与融合。再者,西方汉学家不仅对中国文化有所研究,对自我文化更是了若指掌,他们在翻译与传播当代中国文化时,必然呈现“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品味”<sup>[11]</sup>等特征,而这正是中国本土名人大家可能欠缺的。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 1845—1935)用英文撰写了《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成为了西方东方学院(系)学生学习中国文学的窗口。实际上,该书为庞德(Ezra Pound)英译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

的手稿,即日后的《神州集》(*Cathay*, 1915)提供了莫大的参考。这部由19首中国英语诗歌改译而成的诗作,为世界的英语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窗户。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培养了多批次的汉学家,其中罗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 1717—1761)、列昂季耶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阿加福诺夫(А. С. Агафонов, 约 1734—1794)等,就是第一批俊秀英才<sup>[12]</sup><sup>174-175</sup>。他们一生翻译和注解了大量中国典籍,如《易经》《大学》《中庸》《三字经》《千字文》《资治通鉴纲目》《八旗通志》等。他们在俄国宣扬了中国儒家思想,传播了中国文化,为俄国社会了解中国,以及俄国汉学创立做出了贡献<sup>[12]</sup><sup>175</sup>。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曾在山西的太原帝国大学任职,期间他构拟出古代汉语的语音特征。其研究成果发表在《汉语音系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1926)上,后被赵元任和李方桂译成中文,且在1940年以《中国音韵学研究》为题名出版推广<sup>[13]</sup>。这部创世之作,开启了中国方言学和历时音系学研究的先河,不仅为国内的汉语教育提供了音系的蓝本,也从根本上推动了域外华文教育的兴盛,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渐。

### (三)多语种并行的外语教育

华文教育实践与西方汉学研究的历史证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文化西渐的有效传播,有赖于对母语与外语的熟练掌握,以及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认知。他们都曾在西方或中国进行过外语的学习与体验,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域外对话。只有通过外语才能实现“他者”的认知,“自我”建构的内在需要方能得以实现。尚且,“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sup>[14]</sup>,它是文化汇通的桥梁、文化凝聚的载体。只有在语言汇通之上,文化的互识传播方能实现。正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所言,语言决定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规范。因此,华文教育的成功,离不开多语种并行的外语教育的战略实施。毕竟百花齐放,胜于红梅一支。

王宁<sup>[15]</sup>曾多次论述,外语学科的积极建构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德国汉学家顾彬<sup>[16]</sup>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比如他在批评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时,指出如果他们没

有透彻的了解,而且可以用至少一门外文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这无疑证明了多语种并行的外语教育战略实施的必要,因为它是国外华文教育实践,以及中国文化西渐成功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华文教育实践与中国文化西渐必须注重外语能力的培养,因为语言是文化之窗,“语言交际的最终目的是文化上的沟通”<sup>[17]</sup>。只有借“语言”的帆,才能抵达“文化”的海。林语堂能够在西方世界架起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与他精通英语,并擅长用英语写作密不可分;辜鸿铭用英文撰写中国传统经典,能成为东方与西方学院(系)的学习材料,也和他精通英法德等多国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

### (四)译介的推广

当代中国文化西渐要克服语言的藩篱,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无国界交流,译介的作用不可或缺。莫言虽然不精通任何一门外语,却是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其众多作品在西方享有盛誉。究其原因,主要归功于海外翻译家的译介推广,如瑞典的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法国的译者杜特莱夫妇(Noel Dutrait, Liliane Dutrait)、美国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等<sup>[18]</sup><sup>16</sup>。目前,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通过莫言作品的外文译本,世界得以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文化魅力从此在西方的文艺殿堂扎根发芽。同时,这些译本还激发了国外学生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的热情,为海外华文教育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

美国意象主义诗人大多热衷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如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洛厄尔(Amy Lowell, 1874—1925)等。据赵毅衡先生统计,仅1915至1923年的八年时间,《诗刊》杂志刊登的有关中国诗词的译作,远远超过日本、意大利、俄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sup>[19]</sup>。换句话说,正是翻译拉近了中美两国诗人的距离,中国文化以译本的形式在世界广为传播,这对西方人士主动接受华文教育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沈从文小说在国外能够得到欣赏与认同,与20世纪30年代斯诺(Edgar Snow)对其作品的译介息息相关,更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77)一书中的英语评论关系密切<sup>[20]</sup>。

当代中国也曾向国外大规模译介作品,而中国文学的翻译一直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文化传播的最好载体。谢天振<sup>[18]</sup><sup>16</sup>、鲍晓英<sup>[21]</sup>的相关论文对此已有论证。从《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专刊,以及《大中

华文库》工程也可略见一斑。最早向国外译介作品的《中国文学》与《熊猫丛书》专刊,80%以上的译介内容都聚焦于中国文学。虽然,至20世纪末,《大中华文库》的选题范围逐渐扩大,但译介维度仍然侧重文学方面。据许多等<sup>[22]</sup>分析,这套图书选题110种,其中文学类经典有55种,是哲学思想类的两倍之多、科学技术类的三倍之多、历史类的五倍之多、军事类的六倍之多。其实,中国文化涉及的维度远不限于中国文学,科技、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等都应该与此相关。所以,华文教育的实践、中国文化的西渐,都应增加其它领域的经典译介力度,审时度势,循序渐进。目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推行的“中华外译项目”“中国图书海外推广计划”的规模化实施,可作为推广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译介方式。

#### (五)国外留学、访学人员的文化推动

国外留学、访学人员对当代中国文化西渐存在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一,他们存在外语优势。其二,因为跨国的生活经历,他们具有较高的跨文化敏感度,对目标语言、文化及受众的了解度较高。其三,他们的专业维度宽广,能够辐射的行业较多。其四,他们身处西方世界,这能为当代中国文化西渐提供良好的时空维度。其五,他们是中国国民,部分人士还受中国政府资助,他们是中国文化西渐可以信赖的传播主体。因此,无论是中外语言的转换,还是文化的共通融合,他们都能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好比纽卡姆坚称的“自己人效应”,即“在人际交往中,如果双方关系良好,一方就更容易接受另一方的观点,甚至对对方提出的难为情的要求,也会碍于情面给予回应”<sup>[23]</sup>。实际上,西方汉学的研究院所,或聘请了一些中国名家从事汉学或中国学研究,或接受了一些中国学者进行访学;西方大学的东方学院(系)提供教职,聘请了一些中国教师任教授课。这些国外留学、访学人员对中国文化西渐起到了助推作用。由于国外从事华文教育的教师、学者的研究范围相对有限,遇到一些超出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与文化,他们就不能得心应手地进行研究。诚如葛浩文对萧红、莫言作品的译介,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中国科技思想史的撰写,顾彬对中国诗歌的研究等,无不是中国学者、中国留学生、访学人员参与的结果。他们或负责这些鸿篇巨制的汉语文献翻译工作,或对书(译)稿展开勘验校对,或直接参与其中的研究。这也说明,正是中国籍的国外留学、

访学人员的才华,以及他们文化适应性强的跨文化特征,使他们在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过程中还可独当一面。比如,牛津大学毕业的杨宪益首推的《红楼梦》中国英译范本,其在国外的影响,堪比英国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与闵福德(John Minford)的英译。杨宪益还与吕叔湘、向达等人在伦敦创办中文报纸,进行抗日救亡传播。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萧乾,与斯诺(Edgar Snow)合作编译《中国简报》,后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曾在法国访学,被称作“东学西渐第一人”的陈季同,不仅用法文撰写了《中国人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 1884)等著作,还法译了《中国故事》(*Les Contes Chinois*, 1884)。其中,《中国人自画像》再版十几次,《中国故事》“一年中曾3次再版,总至少再版5次以上”<sup>[24]</sup>。正是他们倾情的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西渐才能得以顺利实施。

#### (六)“孔子学院+”的多渠道传播

自2004年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落成,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62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sup>[25]</sup>。可见,孔子学院在国外的增长速度之快,使其传播密度已大大超过德国的歌德学院。作为各国人员学习汉语语言及文化的主要渠道与场所,孔子学院不仅开设了有关中国的语言、文化类和文哲史等课程,还开设了诸如太极拳、剪纸、戏曲、中医、中国茶道、中国书法等文化实践课程。孔子学院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发挥了桥头堡作用。但孔子学院面临的困境却逐年增多,比如教师数量不足、参与人员跨文化意识薄弱、资金短缺、刻板误解、因地制宜的能力欠缺等,这些问题都会阻碍中国文化西渐的正向传播。而规避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因此,应在孔子学院之外,建立其它并行不悖的渠道,进行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路径实施,形成“孔子学院+”的合力效果。

“多纬度传播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多种资源库组合造成国际受众抗性最小,即国际认同的最大化,这就是最优传播路径,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sup>[26]</sup>相较于孔子学院的单一传播渠道,国外影视、网站、电视节目、报纸、自媒体等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传播,画面感更强,代入感更足,感染力更大,其传播效果及权威性更高。甚至,有能力的个人可以借助“新媒体”,制作一些匠心独运的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外文节目;中国本土的媒体单位,可以与国外的媒体合作,联合制作一些有关当

代中国文化的节目,并借助国外各式媒体播出。比如创办于1897年的《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对中国文化及价值观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法国一家电视制作公司把央视节目《朗读者》模式推广海外,且以《朗读者》为内容的同名图书,在法兰克福书展也实现了8个语种的版权输出;我国外文局也推送了一些外文节目,如分享点滴中国的《中国三分钟》和《中国环球电视网》,以及由外籍记者担任主持人并实现了8个语种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推送的《第三只眼看中国》,都打开了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促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可见,这些文化报刊的价值输出,文化节目的视频传播与图书推介,对于中国文化的西渐都意义非凡。

(七)当代中国经济、自然科学等华文教育内容的添加

当代中国文化无论采用何种路径进行西渐,其传播内容必须打破人文学科的自囿,进行多领域、跨学科的全面覆盖,尤其应该包括当代中国经济、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知识文化。因为世界华文教育既要当代对中国文化有所坚持,更要批判对读,以中国文化的此灯,点亮西方文化的彼灯,反之亦然。如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经济领域的成就,为华文教育内容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借鉴。他的著作曾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载体,被译成多种语言,如《充分信息及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以中文繁体字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还以英、日两个版本进行出版;《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也被译为中文繁体字,实现了英、日、韩、法、越、俄六个语种的译介,并被多次增订;《农村改革和中国的农业增长》一文也于1992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期刊上,并成为从1980至1998年间经济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sup>[27]</sup>。无独有偶,李约瑟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手文献和资料,进而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1954)才会彪炳史册,中国文明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中的重大作用,才得以被发掘。无论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域外传播,抑或林毅夫学术成果的国际交流,都证实了中国的经济与科学技术知识不仅可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而且可以提升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诸如此类具有实用性、共通性的知识与文化,应该增添于华文教育的实践,使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内容更全面俱到,丝丝入扣。

### 三、结 语

由于中西方在语言与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异常艰难,歧路重重。但问题自在,方法先行。中国名家卓有成效的“丝路”华文教育贡献,为当代中国文化的西渐指明了必由之路。因此,本文从华裔汉学家对世界华文教育兴盛的相关文献中挖掘数据,并进行了针对性反观,发现华裔中国名家的自塑之路、西方汉学家的“他塑”之道、多语种并行的外语教育、译介的推广、国外留学和访学人员的文化推动、“孔子学院+”的多渠道传播,以及中国经济与自然科学内容的添加等路径,能为中西文化互识互通的可能对话策略提供参考。因为当代世界文化之间的开放与对话,是消弭误解与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且任何对他者文化的孤立及自我孤立,都不可能获得跨文化的互识、互谅、互通和互鉴,自我文化的超越自然也无从谈起。诚如法国汉学家 Gernet 在第二版《中国社会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up>[28]</sup>中主张的一样,西方不能将中国文化孤立起来,要注重中西文化交流。反之,当代中国文化也不能自绝于世界而自我封闭,必须主动西渐,秉持“丝路”传播的精神,寻求世界对话,实现文化冲突与文化类同之下的他者文化利用。唯有如此,当代中国文化才能在与他者文化的交流互识中,既自我彰显,又彼此互鉴,最终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超越。当然,限于篇幅,本文不能穷尽当代中国文化西渐的所有策略,只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拾遗补缺,更为深入和详细的研究有待后续展开。

#### 参考文献:

- [1] 张应强. 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9.
- [2] 陈明杰. 试谈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G]//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 海外华文教育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 41.
- [3] 林蒲田. 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概论[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9.
- [4] 张梅. 华侨华人与文化“走出去”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 38(2): 26-31.
- [5] 谷慧娟. 《论语》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3): 77-81.
- [6] 曾繁健, 王真真. 中国学人“西”渐: “丝路”华文教育兴盛的缘起[J].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20, 41(2): 100-106.

- [7] 郭晶, 吴应辉. 孔子学院发展量化研究(2015—2017)[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8, 50(5): 36-44.
- [8] 唐智芳. 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7(2): 105-109.
- [9] 刘岩. 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90.
- [10] 曹顺庆. 跨越异质文化[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7: 56.
- [11]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 2014(1): 1-10.
- [12] 周宁. 世界之中国: 域外中国形象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3] 乐黛云, 钱林森. 跨文化对话: 第21辑[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52-53.
- [14] 萨丕尔. 语言论: 言语研究导论[M]. 陆卓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29.
- [15] 王宁. 再谈中国文化走出去: 外语学科的作用[J]. 中国外语, 2019, 16(2): 10-12.
- [16] 顾彬. 语言的重要性: 本土语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学[J]. 扬子江评论, 2009(2): 16-19.
- [17] 刘立勇, 李玉洁. 多元文化框架下的跨文化教育[J]. 河北学刊, 2013, 33(4): 188-190.
- [18] 谢天振, 陈杏. 译介学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传播: 访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J]. 国际汉学, 2015(2): 16-18.
- [19] 赵毅衡. 远游的诗神[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55.
- [20] 耿强. 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96.
- [21] 鲍晓英. “中学西传”之译介模式研究: 以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例[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37(1): 65-71.
- [22] 许多, 许钧. 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 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3): 13-17.
- [23] 白晓亮. 关键沟通力[M].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5: 304.
- [24] 岳峰. 东学西渐第一人: 被遗忘的翻译家陈季同[J]. 中国翻译, 2001, 22(4): 54-57.
- [25]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孔子学院/课堂[EB/OL]. (2020-04-03) [2020-04-03]. [http://www.hanban.org/confuci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http://www.hanban.org/confuci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 [26] 刘瑞生, 王井. “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叙事范式和语境[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2): 151-159.
- [27]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林毅夫[EB/OL]. (2020-04-04) [2020-04-04]. <https://www.pku.edu.cn/details/1056.html>.
- [28] Gernet J.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M]. 2nd ed. Translated by Foster J R, and Hartma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

(责任编辑: 楼倚杉)